

〔以色列〕亚伯拉罕·B·约书亚 著
陈贻绎 译



三天和一个孩子

Three Days And A Child
A. B. Yehoshua



〔以色列〕亚伯拉罕·B·约书亚 著
陈贻绎 译

三天和一个孩子

Three Days And A Child

A. B. Yehos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天和一个孩子/(以色列)约书亚(Ye-hoshua, A.B.)著;陈贻译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8

书名原文: Three Days and A Child
ISBN 7-5004-1591-5

I. 三… II. ①约… ②陈… III. 中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9151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3.875 插页:2

字数:59千字 定价:5.90元

译者简介

陈贻绎, 1971 年 9 月生。1990 年毕业于天津市南开中学。1994 年提前一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希伯来语言文化专业, 获文学士学位。现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犹太文化研究博士学位。

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 曾获五四青年科技论文“挑战杯”二等奖、季羨林奖学金、有大奖学金、光华奖学金、华新奖学金等奖励。题为《中国古代开封犹太人同化现象初探》的论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季刊上。

A. B. Yehoshua

The Stories

שלושה ימים וילד

© By Hakibbutz Hameuchad

Publishing House Ltd. 1993

本书译自 A. B. 约书亚:《故事集》中的一个中篇小说
根据哈基布兹·哈梅乌哈德出版有限公司 1993 年版译出
本书由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协助提供版权

译者序

(一)

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了解太少了，中国读者对以色列文学了解太少了，甚至中国知识界对希伯来文化的了解也可以说远不及对古希腊罗马的了解——这绝不是夸张，而是我在三年的希伯来语及犹太文化的学习过程中越来越深的感触。每一种文化，都堪称一个小世界，而身属另一种文化的人一旦进入其中，便如同进入另一个宇宙，喜其之喜，悲其之悲，遍尝个中酸甜苦辣。而文学作品，往往又是一个外域文化的人开启另一种文化之门的钥匙。我的这篇译作，在此斗胆充数，期望能为中国读者展示以色列当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斑。

(二)

《三天和一个孩子》的作者亚伯拉罕·B·约书亚是当代以色列最出色的作家之一。他于193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一个典型东方犹太人

家庭,父亲雅各·约书亚是一位东方学专家,曾在以色列政府宗教事务部负责德鲁兹和穆斯林事务;母亲是30年代来自摩洛哥的犹太移民。A·B·约书亚的妻子是一位精神分析医生和心理学家。家庭背景对约书亚的写作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约书亚年轻时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攻读希伯来文学和哲学,曾任教于巴黎,现为以色列海法大学希伯来文学和文学综合研究系教授。自1962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以来,至今已出版了14部作品;根据其作品拍摄的电影已有5部(其中包括《三天和一个孩子》)。他创作的剧本、散文与小说同样出名,他的作品已被译成13种文字,销售量近百万册。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12篇围绕着他的作品写成的博士论文。他的一些作品还被选入以色列中学教材中,为每个以色列青年所必读。

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文学与犹太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以色列建国前夕及建国初期,文学作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希伯来语这一复活了的古老语言,为犹太民族的解放运动而摇旗呐喊。犹太民族共同的苦难经历造就了一批以改变民族命运为己任、强调重视集体精神的文学作品。随着时局的变化,渐渐出现了一批从集体

经历中摆脱出来，将创作重心转向个人经历及个体情感世界的青年作家，被评论界称作“新浪潮的一代”。A·B·约书亚就是其中一分子。他们以以色列的现实为背景，但又避免强调以色列公民做为犹太人存在的特殊性；他们将犹太人的个性问题视为整个人类“存在的惶惑”的表现，从而在其作品中以人物的“内省”去揭示人类共同的命运。约书亚于1962年发表的故事集《老人之死》就是一部着力于描写建国以来以色列人的经历的作品集（包括《老人之死》、《戈利娅的婚礼》、《面向森林》、《诗人的持续愈甚的沉默》等）。

但每个人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并受其影响。约书亚的作品，乍看上去是以个人或是小家庭为中心，但实际上，在这些对个人和家庭的描写中却蕴藏着对民族集体命运的关心。这种关注正如约书亚在本书序中所言，与“个人的故事”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把握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起伏不定的趋势。1982年他父亲去世后，他开始着手写与自己经历有关的塞法拉迪人的过去。他于1990年出版的《马尼先生》向读者展示了一百多年来塞法拉迪犹太人的生活情景和精神状态。

由此可见，做为“新浪潮的一代”的代表性

作家，约书亚具有特殊的双重性。他既致力于以个体人物为中心的创作，又致力于以色列民族生存事业的描绘，后者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从他本人就是左翼政治力量的积极参加者这一点足以证明。

(三)

A·B·约书亚的小说被誉为以色列“现代古典主义”小说的杰出代表，他的天才的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具有特殊的震撼力。以色列著名文学评论家当·米龙评论他这方面的出色天才时称：“如果处于发展中的以色列文学失去 A·B·约书亚这样一位极具推动作用的作家，将会造成无法弥补和承受的损失。”《纽约时报》也称他为“以色列的福克纳”。

他“以一种曾被称为反意识流的手法，探寻威胁着文明人体面的外表的动物本能，剖析人们彼此之间的孤独，他们的群体以及个体。”他的作品“直插入人们心理思维的无意识层……（其高明）连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为之逊色”。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一看约书亚本人是怎样讲的，他说：“过多的现代作家在借助心理学的工具创作作品，并由此得出了一些过于简单化的动因和解释。例如主人公的母亲要是

冷淡的话，他则偏爱那些热情洋溢的女性。而事实上，即使我们了解主人公所有的过去，也绝不能将他所有的一切均归因于心理因素。而自然科学工作者与此正相反，相信所有的一切都归属于物质，甚至认为爱情也是由脑电波导致的。显而易见，这也不完全正确。我认为爱情是除了以上说到的两种原因外，还和一种我暂且将它叫做‘神秘因’的合力的产物。”

在读《三天和一个孩子》时，读者或许会体会到约书亚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与卓越才华。

另外，这部作品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在创作中的另一个重要关注对象，这也是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约书亚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曾说到：“是什么使一对恋人彼此吸引，又是什么将他们结合在一起？”……“情侣是我的每部作品中最让我激动的主题。这是一种最亲密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又是最具自由的关系，在你同你的儿子或父母之间无自由可言……而情侣之间，则需要随时随刻地选择和维系——这就是说随时都可以断绝这种关系。”

就这样，约书亚怀着对爱情的关注，用不露痕迹的心理描写，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普通的以色列单身男人和他以前的恋人，恋人的丈夫，孩子，现在的恋人，这位恋人的另一位情人等若干

人的平淡而又跌荡的感情纠葛和经历。

(四)

今年春末夏初,当我从我的外籍教师手中接过这部小说的希伯来语原著时,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能够由自己翻译这样一位大家的作品,而且是中国第一次由希伯来语直接翻译成汉语的尝试,对我来说,可谓莫大的荣幸;另一方面,这是自己第一次翻译这么重要的作品,况且学习希伯来语也只有三年,能够成功地反映原作的风貌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一边照常听课,一边开始了翻译工作,其间艰辛困顿自不必说,但在多方面的热情帮助下,终于在二个月后基本定稿。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我的外教汉学家尹婷(Ilana Wistinetzki)女士所给予的无私帮助,从第一遍通读原著到译稿敲定的全过程中,是她随时耐心地解答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帮助我正确无误地理解原著语言及其风格,并一字一句地让我将译稿念给她听,然后核对原文,为我指出不妥之处并提出她的修改意见。之后又是她帮助我与以色列使馆取得联系商讨出版事宜。

A·B·约书亚本人欣然同意我将译作发表,并作序一篇,而且亲笔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

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使我颇为感动。

另外,以色列驻华使馆文化处的埃亚勒·普罗泊(Eyal Propper)先生以及石春暖女士等使馆工作人员在帮助联系出版事宜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以色列驻华使馆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曹宏举编辑在统校文稿及出版事宜中也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劳动,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译文中会有一些不妥之处,诚请各位读者指正!

陈贻绎

1994年7月25夜

于清华园

作者中文版序

尽管我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并在许多国家发表,我仍然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我作品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的出版。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理所当然地欣然承诺写这篇关于我自己,关于我的创作,而且也理应是关于现代以色列文学的简短序言,以便使中国的读者更容易理解这本书。

我 1936 年出生在耶路撒冷一个塞法拉迪犹太人(是指那些祖先在 15 世纪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家庭。我的祖辈是在 19 世纪早期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虽然犹太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虽然在这一点上略逊于中华民族),却在上下 2000 年的岁月中背井离乡,流散于数十个国家。只是在这个世纪初他们才开始慢慢地再次聚集到故土。这样一来,现今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其祖辈在巴勒斯坦地区生活了五代人以上就寥寥无几了。

我在耶路撒冷长大，那是一段对犹太民族来说生死攸关的时期。在我有生的 57 年中，亲眼目睹了对我的民族来说举足轻重的大事。悲剧接踵而至，而与此同时悲壮的英雄人物前仆后继。首先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二战期间席卷了整个欧洲，其间犹太总人口的 $\frac{1}{3}$ (600 万) 惨遭屠戮，之后是 1948 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以及这个国家为了生存而同周边国家进行的战争。我自己作为一名士兵参加过其中的几次，而我的几个儿子中，有的曾做为士兵参战，有的则仍在为此而浴血奋战。

这些关系民族存亡的重大事件对现代希伯来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希伯来文学以无比积极的态度参与了犹太民族回归故土的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要方式是通过其自身的发展促进希伯来语的复活与再生。希伯来语是犹太民族古老的语言，正是使用这种语言，这个民族在 2500 年前写就了《圣经》以及其它许多重要文学、哲学著作。这一语言在犹太民族长期的流散过程中演变成了一种具有神圣性质的语言，只限于在宗教仪式中使用；而在生活中犹太人民则使用他们所居住地区居民的语言，或是使用特殊形式的犹太语言。只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随着犹太民族的世俗化以及民族意识

的崛起，才重又讲起这古老的语言，并使之发展成自然的现代语言。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曾被誉为并且仍被认为是全新的以色列民族属性的重要设计师。

我在中国读者面前强调这一事实，是因为再没有别的人能够比你们更能理解历史传统在当今现实社会有机体中活生生的存在；同样，你们也更能理解摆在作家们面前的永久性挑战：在全神贯注于瞬息万变的新鲜事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丧失对过去的责任感。我们不是总能够兴奋地发现上千年前的文学传统，是怎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风格吗？例如唐代传奇或是《太平广记》对茅盾、鲁迅等的影响。

我以及我的同事们的文学创作或多或少地是在两种压力下进行的，一种压力源自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一方面，要去充当一个绝无仅有的听众的角色，并用各种全新的文学创作技巧和手法去反映当今世界令人眼花缭乱、日新月异的各种迅猛变化，而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子孙，仍要时刻保持，尤其是通过母语的使用，对与之有着深厚联系的几千年前的世界与思想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应仅仅表现为对传统的表面上的恭敬，而应是一种对过去价值观

念的清醒认识。这些价值观念对我们当今的生活以及民族属性有着各种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如果想要纠往补过,并力求对现状有所改变,我们就不得不对那些时刻与我们为伍的过去的精神风气了如指掌。

另一种压力源于作家如何保持个人经历与他和民族无法摆脱的联系之间的微妙而又适度的平衡。作家个人的故事为文学作品提供了特定情境以及人所共有的感情世界,这些是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所在;而民族问题则总是受到许多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的困扰和冲击。

这后一种压力在最近这 35 年间一直主宰着我的写作。每当我写的小说重心偏向民族总体方面或是与之相反的个人方面,我总是对受到歧视的另一方有着某种程度的负疚感。

我的中篇小说《三天和一个孩子》(曾被改编成一部以色列电影史上十分出色的影片)是在 60 年代写就的。那时就民族危机而言,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正处在暴风骤雨(1967 年战争)前的暂时宁静中。于是我就幼稚地设想去写一个现代的爱情故事,并使它与所有的民族以及文化背景相脱离。然而有一位见解独到、目光敏锐的评论家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中篇的大

论,他在这篇文章中论证了《圣经》中的古老神话“被捆缚的以撒”是怎样地被不知不觉地折叠并隐藏在我的并不幼稚的小说的一页页纸中的。

A·B·约书亚

